

异端思想的背后

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札记



贺雄飞 主编

施 亮 著

何谓异端？中国历史上有无异端？

用唯美而荡气回肠的文字

书写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荣辱与沉浮

二
中国

图书馆

BZ1
13



贺雄飞 主编

异端思想的萌发

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札记

施 亮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式编目 (CIP) 数据

异端思想的背后 / 施亮著.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9.7

ISBN 978-7-80179-868-8

I. 异… II. 施… III. 思想史—研究—中国—古代
IV. B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12967 号

异端思想的背后

著 者: 施 亮

责任编辑: 裘挹红

出版发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东滨河路 11 号西门)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12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12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179-868-8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异端与正统（序）

吴 思

这本书所描述的思潮和人物，从魏晋玄学、禅宗、心学，到欧阳修、李贽、顾炎武，或多或少，都有些异端色彩。

所谓异端，总是相对正统而言。秦汉以来，什么是中国意识形态的正统？一般都认为是孔孟之道。但这本书提到一个故事：万历七年，皇帝下诏禁止士人聚徒讲学及私设书院——这种政策我们早就熟悉到麻木不仁的程度了，偏偏有一个叫何心隐的不服，以孔孟聚徒讲学为例，反对这个规定。经此提醒，我们才意识到，帝国政府竟然禁止儒生模仿孔孟。那么，孔孟之道真是正统吗？

我想在更加深广的背景上讨论这个问题。

我认为，自秦汉以来，在中国当家作主的社会集团，始终是官家集团。所谓官家，在古汉语里有三个涵义，一是指皇帝，二是指衙门，三是对官员个人的尊称。这三个主体在各自的地盘上立法定规：皇帝设立王法，衙门设立地方或部门法规，官员个人设立潜规则。无论官家内部如何争夺地盘，作为一个整体，官家集团主宰了法规和道义。这样的社会，主宰者不是封建贵族，不好叫封建主义，又不是地主和资本家，也不好叫地主主义或资本主义，我姑妄称之为官家主义。

官家与儒家的合作最为密切长久。儒家的主张，既尊重了统治集团的地位，又适当照顾了被统治集团的利益，实行起来不像法家那样动辄走偏，而且论证周详，各方容易认账。孔孟之道近似一套官民协议和君臣协议，尽管协议明显有利于官大的一方。

不过，官家并非无条件接受儒家主张。最醒目的证据，就是朱元璋删掉孟子主张臣民反抗权的段落。再往前追，汉儒各家对经典的解释不同，皇帝多次出面“称制临决”，统一认识，强调三纲六纪。如此一统的儒家，已经不是原教旨的儒家，而是修正主义儒家了。

总而言之，儒家教义是一个大套子，但这个套子是官家选择并修正的。官家主义是一个更大的套子，里边掺杂了儒、道、法各家的东西，还有一些流氓无赖和强盗的独门秘籍。儒家法家道家兵家佛家等等，或者匍匐在官家脚下，或者趋附于官家左右，构成官家大套子里边的大大小的套子，至少获得了官家的支持或认可。这些次级套子里又有更次一级的套子。例如儒家里边有程朱理学，又有陆王心学。相对理学的小套子，心学也算异端。

前边说了，官家集团并非铁板一块。除了官家集团的整体利益，皇帝、衙门、官员，各自还有特殊利益，这些未必明说的东西，在特定的圈子和时段之内，也形成了一套传统，谁不懂事，不尊重这套传统，很可能要碰个头破血流。

如此说来，到底什么是异端呢？第一，只要触犯了官家主义这个三头六臂的家伙，便是官家眼里的异端。第二，大大小小各级各路套子的出格者，便是各种套中人眼里的异端。

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历史上到处都有异端。重新解释经典的自不必说，就连那些倡导新文风的，不肯拍马屁的，弃官当和尚的，也有几分异端色彩。不过，从根本上说，真正的异端，反对并顶替官家主义的异端，在西学传入之前，真可谓踪影难觅。最卓越者，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贬低君主，赞美工商重新界定匹夫百姓的名分和责任，但这些调整的幅度，不过十之二三，远未到另起炉灶的水平，更谈不上破旧立新了。改编本书所引黄仁宇的话说：“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我国历史上的异端，“只能长成灌木，不能形成丛林”。

在西方现代主流观点看来，正当的套子只有一种，就是禁止以暴力欺诈的手段伤害他人。只要不损害他人的自由，一个人的自由就是不受限制的。这种自由体现为平等的公民权利，政府则是自由的保护者。这套说法，是否依然属于异端？

本书作者是我的老朋友。受朋友之托，为本书读者提供一种背景参照。是为序。

2009年6月21日

目 录

异端与正统（序）／ 吴思	1
--------------------	---

异端思想的背后

——“中国第一思想犯”李贽的生命沉浮	1
--------------------------	---

他深深领悟了人生的真谛，生活与寂灭，现实与理想，这是缠绕在人们身上的矛盾，是不可超越的，又是可超越的。也许，真正忘情物外的人生境界难以达到，但是那种对自由的追求却永远不能放弃。

历史空谷中的清绝流韵

——“竹林七贤”的痛苦悲剧	22
---------------------	----

它不是伟大的，也不是高尚的，它是痛苦的。我想，这可能也是中国思想者集体的痛苦。他们想要超越，却无从超越；他们想要突围，却又无从突围。只好在迷圈里打转转，只好用宿命来代替救赎，只好将沉思玄想的迷雾来涵盖一切。

禅学漫笔

——佛教禅宗思想的嫁接与流变	39
----------------------	----

1924年，美国的一位哲学家来华考察佛教，他风闻北京城信佛的文人间盛传，曾经是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深谙佛理，见性成佛。于是，他去访杨度，听杨度滔滔不绝讲了一番禅理，真是倾倒之至。不料，杨度又出一语曰：“我即是佛。”那位哲学家则大为惊愕，以为杨度是信口开河。后来，他读到杨度赠他的《我佛偈序》

一文，才明白杨度所言确实是得自禅理。

花 非 花

——一代儒学大师王阳明的尴尬····· 60

王阳明心学的重要特色之一，是用禅学的思维方法来深化儒学的价值立场，用哲学的方式来解释宗教性的问题。但是，他的神秘主义的心灵体验实质上却否定了儒学的某些道德性主题，也否定了儒家形而上学的观念。作为一代儒学大师的王阳明，也不可能深化对这些尴尬主题的思考。这也就使心学的取向快要接近佛教时，不得不在山门前止步了。

深沉的历史目光

——顾炎武：中国思想史上的奇迹····· 78

梁启超先生极力推崇顾炎武的学术思想，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为代表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爱国主义传统，其对封建旧文化的批判精神和政治上的革新要求，即使经过一百余年的曲折发展，仍然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改良运动起到了某种奇异的酵母作用，这不能不说是思想史上的一个奇迹。虽然顾炎武的思想混杂着新的幼芽和旧的陈渣，某些进步思想也仍然以阐述和解释儒家经典的形式出现，但是，他对宋明理学的强烈批判，在政治设想中提出许多带有民主色彩的改革主张，经济上主张农工商皆本，这些都是符合历史时代潮流的进步思想。

一阕声长听不尽

——一生敢说真话的“大知识分子”欧阳修····· 94

吴思曾经认为：“作为意识形态性的执政团体，儒家集团具有两重性：既是儒家道统的传承者，又是皇家法统的雇员。”或者，其中既有虔诚信仰者，亦有借此而升官发财者，但由于儒家集团本身的弱点，特别是它的涣散性，“因此，儒家集团难以摆脱对皇权的依附状态”。

荣辱与苦难的心灵超越

——“一肚皮不合时宜”的苏东坡…………… 113

一日，苏轼晚餐后在院里散步，一边摸着肚子，一边问身边几个婢女：“你们说，我这肚子里装的是什？”一个婢女抢先答道：“都是文章。”苏轼微微一笑，否定了她的话。又一婢女逢迎地说：“都是机智与灵巧。”苏轼又摇摇头。最后，侍妾朝云不急不徐地说：“依我看，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捧腹大笑，将朝云引为知音。

亘古男儿一放翁

——忧国忧民的大诗人陆游…………… 138

嘉定三年春天，这位86岁的老诗人临终前又写下《示儿》一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首诗久在人们口中传诵，它写出了个爱国主义诗人真挚渴望祖国统一的拳拳之心。后人评论此诗：“示儿一绝，有三呼渡河之意。”就仿佛是爱国将领宗泽临死前三呼“渡河”，其悲壮之心感人泣下。

帝国之舟的纤夫

——改革家张居正的命运…………… 159

梁启超认为，张居正当名列中国六大政治家之一；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认为，张居正是明代惟一的大政治家，且是自汉以降只有诸葛亮和王安石稍可比拟的优秀宰相；而撰写《晚明思想史论》的嵇文甫先生则认为，张居正不仅是一位优秀政治家，而且“他的政治建树实以学术为根柢”，吸收秦汉以来的法家思想精华，也是一位有见地的思想家。

萧萧悲壮士

——袁崇焕个人命运的荣辱沉浮…………… 177

乾隆皇帝此举或许是沽名钓誉，或许是收买人心，或许是向往做一名胸怀通达的旷世明主，这些都暂且不谈。使人感慨不已的是，后人该如何看待这一段历史？明朝忠臣的冤案竟然由一百五十二年后的清朝才来昭雪，更何况袁崇焕还是清朝祖先打天下的死敌，对明

朝历史来说岂非仅仅是一桩尴尬话题？这是明王朝的奇耻大辱，而且这种耻辱是铭刻在历史柱上的。

寻梦者的困惑

——中国官场中的“异类”汤显祖…………… 192

也许，命运早就注定他不该走上仕途。曾有一句格言说，性格即命运。而汤显祖的性格、情感和理念，早已决定了他的官运不会畅达。他在中举后，又连续参加四次进士考试而落榜。这是不难理解的，汤显祖一直对宋儒理学那一套不甚感兴趣，更多地倾向王阳明心学，这从他以后所交的朋友李贽、达观等即可看出；而他的诗人意绪化性格也不耐受制艺文章的拘束，更不会合考官口味。

忏悔的诗人

——痛苦与矛盾的吴梅村…………… 210

可惜，连绵的思索怎么也抵不住残酷的现实，人在历史风云中常常是自己难以掌握命运的。一纸清朝诏令下达，在两江总督马国柱的举荐催逼下，吴梅村不得不在顺治十年九月离乡北上，去做清朝的官吏了。以后，这成了吴梅村一生中最大的污点，也酿成了他一生中更深刻的思想痛苦。

李渔人生的“无声戏”…………… 224

李渔是个多才多艺的文化人，也是一个复杂的作家。他本身的复杂性，有其猥琐鄙薄的一面，又有辛酸痛苦的另一面，却是与当时的时代和社会的政治风云变幻联系一起的，与中国文人的天生软弱性更是难以分开的。

后 记…………… 243

异端思想的背后

——“中国第一思想犯”李贽的生命沉浮

他深深领悟了人生的真谛，生活与寂灭，现实与理想，这是缠绕在人们身上的矛盾，是不可超越的，又是可超越的。也许，真正忘情物外的人生境界难以达到，但是那种对自由的追求却永远不能放弃。

一

明朝万历八年三月，云南省姚安知府李贽向巡按云南的御史刘维提出辞职的请求。此时，李贽在任期上还未满三年。刘维曾考查过他的政绩，真是有口皆碑，正待要奏报朝廷给他加恩晋级，闻言吃一惊，遂苦言相劝挽留。李贽慨言，他不愿做“非其任而居之”的“旷官”，亦不愿“贪荣”、“钓名”；为明心志，干脆远走大理，躲入鸡足山，潜心钻研起《藏经》。

巡按御史刘维始知李贽去意已决，遂与布政司和按察司的“两台”商议，奏明朝廷，允准李贽致仕。

李贽离任时，携带的行李寥寥无几，除几件随身衣物外，囊中仅有图书数卷，以及佛寺送的几本佛典而已。同事与弟子们将他送出城门，却见一大片黑压压的百姓市民遮道相送，攀扯车辕，跪卧于大道，使得车马不能行。有感恩泣诉的，有苦苦挽留的，也有赠土产的，也有献字匾的……李贽面对如此热烈的场面，内心感慨丛

生。他对百姓并未做太多的事，只不过是宽厚待民，极力主张在这个“远方杂夷”的地区应当宽法缓征、与民生息而已，竟得到人们的感恩戴德！愧疚之余，他深感民众的善良！

李贽辞官，使许多士大夫们不解。他此时已 52 岁了，二十余年的宦游生涯也颇为艰难，从一个官职九品的河南辉县教谕，几经转迁，栉风沐雨终于升至四品的知府，正是年富力强之时，并且官运亨通，仕途一片光明，他却抛官不做，在常人看来真是不可思议。

其实，这些人怎么能知道，李贽从未对官场感兴趣过。他求职做官只是为糊口而已，因为在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倘若不入仕途，就只能过着底层的穷苦生活，像《儒林外史》中未中举的范进一样，在人们的白眼里生活。李贽还要担起家庭的重担，甚至负有照顾整个家族的义务。他非常讨厌科举，非常讨厌程朱理学，像朱熹的《四书集注》那类的书，怎么也背不下去。可是，为生存他又不得不干自己不愿干的事情，应考前他选了一条捷径，发挥他的惊人记忆力，竟一气背诵了五百篇八股文，考试时他寻章摘句，兼采众长，很快就交卷了！以后，他曾自嘲这样不得已的做法：“此直戏耳！……但作缮写誊录生，即高中矣！”中举后，他更将科考看得淡，不想再赴京城去考什么进士，以为只要能糊口也就够了。但做一个低层的小官吏，位卑俸微，只能清贫地勉强度日。他后来升为南京国子监博士，到职才数月，因父亲去世，丁忧守制。在家期间，逢倭寇入侵，他曾率领土民登城守卫。战争结束，粮食缺少，他只好携带家眷奔往北京。在北京任国子监博士，但不久，祖父又逝世，他只好将妻子黄氏与三个女儿安顿于河南辉县，为她们购买数亩田产，耕作自食。自己回乡奔丧。殊不料，那一年河南大灾荒，两个女儿相继饿死了。李贽是饱尝过贫苦滋味儿的，他曾讲过自己七日未食，到了未辨“稻粱”与“黍稷”的地步，可说是饥不择食了！所以，他与那些肥马轻裘的公子哥们不一样，对民间疾苦是有着深刻体验的。

嘉靖四十五年至隆庆四年，李贽在北京补礼部司务，他开始接触与研究王阳明的学说。这可能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他结识了同僚礼部郎中徐用检，此人以禅理解道，颇有所得。当时，王阳

明哲学大兴，讲学之风四起，李贽甚好奇。有一天，徐用检用手指在桌子上写“金刚经”三字，告诉他：“此不死学问也，若亦不讲乎？”李贽听他讲学，从此开始对佛学感兴趣。以后，他又结识了王阳明的另一信徒李逢阳，更加醉心王学。他原来就厌恶朱子的“格物穷理”，认为那是玄而又玄，故弄玄虚，而对王阳明的“平常心是道”的学说，感觉甚为合拍。尤其是其中的反权威精神，更觉得有知音之感。

隆庆四年至万历五年，李贽改任南京刑部员外郎，他的交往比过去更多。他认识了焦竑，还有学界鼎鼎大名的人物耿定向以及他的弟弟耿定理；他还有幸拜见了所谓“左派王学”的代表王畿，只见了两次，谈话并不多，但却使李贽与王学更为接近了。以后，他又拜了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之子王襞为师，进一步接受了泰州学派的影响。这是晚明启蒙思潮中的一支进步思想力量，它继承王阳明哲学余绪，激烈地批判程朱理学，强调社会平等，肯定人的物质欲望，将王学中含有的反传统思想和个性解放因素发展起来，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李贽开始站在了时代思想的前沿，虽然他自己的理论学说还未成形，对新学的精髓还未完全消化，但他已经感受到了精神探索的快乐，他因此下定决心从俗务的羁绊中挣脱出来，潜心钻研学问，著书立说。

李贽的妻子黄氏，也深为赞成丈夫辞官。她知道李贽性情真率，不入官场浊流，又有自己的思想，这些都是惹祸的根苗。她希望丈夫致仕归隐田园，回家乡可过安稳日子。况且四品官的俸禄养活一家人已很富裕，也不必再奔波劳苦了。不过，她并未真正理解丈夫。李贽根本无意归乡，也从未有什么归隐田园之意，在他看来，那种生活简直就是犹如朽尸泥塑一般，他的真正愿望是寻得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读书钻研学问，探讨人生奥秘，专心著书立说。这并不是避世，而是更深的人世。黄氏跟随李贽在黄安居居住五年后，越来越明白了丈夫的心迹，不由得产生一种深深的忧虑，她从潜意识中感到：丈夫将从官场风波之地转入时代思想激流之中，那么，其凶险岂不是更加难测吗……

二

万历九年，李贽夫妇来到黄安，居住在好友耿定理处。他的女儿及女婿也一直在那里，曾拜托耿定理照看。他是三年前从北京往云南赴任途中，路经黄安城，与耿定向、耿定理兄弟探讨心学又结为好友的，在耿氏兄弟反复劝告下，才将女儿及女婿寄居在此处。这时，耿氏兄弟的父亲刚谢世，耿定向也守制在家，他们的居所便成为热闹处，许多人来往频繁，论学求道。

相处日久，李贽渐渐察觉出他与耿定向虽然共同信奉王阳明的心学，但旨趣却迥然相异。耿定向的心学观念是很保守的，思想核心仍然是孔学，不过是接受老庄、禅释的哲理，来给儒学抹上一层神秘的幻美色彩，所以内心深处，他仍然是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的。而李贽则是在融通儒、释、道三家后，企望有所超越，不为任何一家所束缚，努力去探索人世间的真谛。这种思想使耿定向深为恐惧，认为是异端，是野狐禅，是离经叛道。他们俩彼此间的观念差异，越来越扩大，以致形成思想对立，后来爆发了一场论战。

其实，耿定理的某些思想也与李贽是不同的，他得力于左派王学的启迪，以禅宗致知法化解儒学，把自我之有化为无，达到泯灭有无的遗世境界。所以，他一生超越是非，超越功利，从未应考，也从未做官。而李贽主张“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其遗世独立的精神仍然被用世之心所牵挂，目光仍然关注着人生。可耿定理天资聪慧，秉性忠厚，发现了哥哥与李贽间的思想矛盾，总能从中调解两人将起的冲突。

万历十二年，耿定向丁忧守制毕，很快被起用为北京都察院左金都御史，七月初赴京上任。就在他离家不久，耿定理遽然病逝。

不久，耿定向与李贽的论战也公开爆发了。耿定向认为李贽迷

误耿氏弟子，说二弟定理无意功名，任情自在，都是李贽带坏的，而且害怕自己的子侄继续受李贽影响，几次在信中责怪李贽“因他超脱，不以功名为重，故害我家儿子”。而李贽则愈来愈看清楚耿定向伪道学的面目，尤其是耿定向的朋友何心隐被朝廷迫害致死的事件中，武昌城数万人为其喊冤，耿定向是有力量救朋友的，可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惟恐得罪权势者，坐视不管，连一句公道话也不讲。事后，他假惺惺落几滴泪，为何心隐作《招魂辞》，还把自己比喻成“不避恶名以救同类之急”的东郭先生。李贽以后在《焚书·答耿司寇》中写信揭露他：“东郭先生不避恶名以救同类之急，公其能此乎？我知公详矣，公其再勿说谎也！”

这一回论战，也是李贽的思想发展过程中的转折点。以前他只是专意读书求学，潜心悟道，即使与别人有思想冲突，也是用忍耐功夫化解，而从此再也忍不住了，他对伪道学的极大义愤猛烈爆发出来。这一场论战持续了很长时间。耿定向官高位显，有着许多门生弟子，他们轮番出来挑战，甚至造谣诽谤，却个个都被李贽批驳得无言以对，落花流水。李贽与耿定向的论战也不仅仅是私人意气之争，这对他磨砺思想，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学说是颇有益处的。

李贽最恨伪道学，而明代的道学最流行。他们打着程朱理学纲常伦理的幌子，欺世盗名。很多无真才实学的人，口中空谈义理，猎取功名，“平居无事，只解打躬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国家一旦有事，他们束手无策，“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诿，以为明哲”。结果，明中叶以后，社会动荡不已，倭寇频频入侵，东南半壁糜烂，北方边境也是外患不绝，流民遍野，怨声载道。更有些无耻之徒，口称仁义，行同狗彘，专以欺上压下，谄媚权势者为能事，朝廷更是政治丑闻不绝。例如嘉靖年间，奸相严嵩执掌朝政时，竟有朝臣三十余人拜倒其脚下甘当义子，这是明末士风颓败的一个证明。

李贽在批判封建道学时，并未仅停留在揭露几个道学家的伪善丑恶面目，而是更深入地从思想层面解剖其虚伪本质。程朱理学的信仰者提出“道统论”，自称是尧舜传孔子，再传孟子，以后就中断，

而他们程朱学派则是继承孟子，才是道统的正脉。李贽斥其论为“大谬”，指出“人无不载道”，道是不能离开人的生活存在的。他还质疑“理能生气”的说法，认为世界本原不是那些人所称的在天地之先的“太极”，或凌驾于气上的“理”，最初只有天地，只有阴阳二气的对立。他更蔑视“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在《焚书·答邓石阳》中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在《道古录》卷中还提出：“夫圣人亦人耳，既不能高飞远举，弃人间世，则自不能不衣不食，绝粒衣食而自逃荒野也。故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所以，不应该讳言人的物质欲望，也不该讳言人的私心。自私是人的天性。他在《藏书·德业儒臣后论》中又一针见血地说：“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他特别提出应该顺应这种天性，使之充分发展。顺其私心，能坐致太平；违其私心，则天下大乱。崇尚功利，发展生产，方能使社会繁荣。

在明代中后期，朝廷的海禁政策日渐松弛和废止，更促进了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往来、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日益频繁，还出现了不少拥有雄厚资本的商人团伙，尤以徽商与晋商最为活跃。而当时的社会也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在全国各地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兴起了许多繁荣的工商业市镇，在那里出现了大批以雇佣劳动为主的手工工场。仅江南苏州一地，有的手工工场的工人就有数千人之多。城市大规模发展，市民阶层也随之迅速扩大。这些情况使得人们的社会风尚发生变化，也不能不影响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此时，王阳明的心学盛行，又从中分化与发展出泰州学派，可说是充分反映了市民意识的要求。它是继承了王学的某些重要方面，但是有重大突破，更激烈地扫荡了程朱理学的纲常伦理教条，提出了“百姓日用即是道”的观点，把“圣人之道”与野间百姓的日用之学等同起来，具有破坏封建纲常伦理道德基础的作用。而泰州学派的何心隐，则又提出“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逸，性也”的看法，以为物质欲望是合乎人性的，但应该在适当满足人们合理欲望的前提下，有所节制。这些思想学说都与李贽的看法相

近似，反映了当时市民社会要求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以及摆脱专制束缚与发展自由竞争的愿望。

李贽是福建省泉州晋江人。泉州早在宋代便设立了市舶司，一直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是中外商品的汇集地，那里居住着数以万计的国外商人。李贽祖先几代人都曾经从事航海贸易活动，他的家族原本姓李，至某远祖林间，因长期居住外婆林家，受林家活命之恩，所以改姓林。家谱记载：其二十世祖林弩就是泉州巨商，明代洪武年间从事海外贸易往来于西洋，娶“色目人”为妻子，并且跟随其妻子信奉天主教。后来，家族的后辈们也纷纷仿效，林弩之子林通衢也娶伊斯兰教女子为妻，宗族中还有子弟与西域人蒲氏、回族丁氏等异教女子结婚。他的家族在婚姻观上具有开放的自由意识，林弩埋葬母亲钱氏时，就大胆地“墓式用回制”。而影响到李贽，他死前曾经立下遗嘱，葬式也须用回制，“头照旧安枕，而加一白布中单，总盖其上下，用裹脚布廿字，交缠其上”。或许，李贽的血管中流淌的正是祖先的那种充满了自由叛逆精神的血液，他奋力挣脱礼教束缚，追求遗世而独立的境界，追求个性的解放和自由。

李贽的思想在不断发展，可能在那些孔孟之徒的眼里越来越走向了异端。作为传统卫道士的耿定向看来，这些异端邪说突破了心学的藩篱，已经很危险了，他不得不跟这位过去的老朋友决裂。而李贽呢，他正酝酿着那篇《答耿司寇》的长信，打算将两人的思想理论的分歧彻底挑明。就在万历十三年春，李贽与妻子黄宜人及女儿女婿离开了黄安耿家。当时，他做出决定，妻子及女儿女婿回到泉州老家，并将其宦囊之资统统带走，而他自己只身去麻城。妻女都很难理解他的想法，苦苦相劝，仍然难挽回他的决定。离别的那天，举家为之号恸。他的一位朋友描写当时的凄惨情景，也是很不忍心。他们或许不明白，已至风烛残年的这位老人，为何偏偏要与家人分开，孤身一人去四处漂泊呢？其次，李贽心中也是寂寞的。以后，他在信中自称是“流寓客子”，正是流露出此种孤独之情。

他读书、交友、求道、漂泊，究竟为了什么？他痛苦而艰难的思想探寻又为了什么？

三

李贽将家眷送回泉州老家后，到了麻城，先是在好友周友山、曾承庵为他修建的维摩庵居住。这维摩庵分前后两院，前面是香火院，每月可得烧香拜佛收入约70余两银子；后面则是书院，也是李贽读书求道的住所，窗明几净，环境清幽。

李贽很喜欢这个僻静的处所。他在这里认真钻研学问，勤奋写作，仔细地梳理一下纷乱的思想。他的身体孱弱，整日地读写，较少外出活动，使他患有严重的脾病，竟闹了一年多，后来他在老友周柳塘的信中称自己“几成老废，百计调理，药转无效”。

李贽还有一怪癖，后人称是强迫性洁癖，据说是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一种，是由于焦虑过度引起的。与他接近的几位朋友如袁中道、刘侗等的笔记中都有记载，说他天性爱扫地，每日不停地洒扫庭院，弄得好几人为他扎扫帚也供应不够。他还要不住地洗衣洗澡，“拭面拂身，有同水淫”。室内洁净无尘埃，讨厌与俗客往来。若陌生人访问，必要别人远远对坐，惟恐闻到浊气。

在那里住了三年后，万历十六年的夏日，麻城的气候特别闷热，李贽躲在屋内读书，身体不动弹，仍是热汗淋漓，厚厚的发髻中也犹如水洗似的。天生的洁癖使他不住地洗头洗脸，搞得房间里一片水湿。抚摸着湿漉漉的长发，李贽知道前院正有一个佣人在给别人剃头，心中不禁一动，把头发全剃光岂不痛快？他立刻叫来那个佣人，令其除发。佣人甚为惊诧，但李贽说此事自己做主，要他不要管那么多，佣人也只好应命了。

从那些士大夫们的眼光看来，这无异又是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若是李贽完全遁入空门，倒也罢了。可他并未举行皈依佛门的什么仪式，既未炙顶，也不着袈裟，头顶光光的，下巴却留着长须，还